

常宁文史资料

邵正安题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
常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月

常宁文史资料第5辑目录

一位历史学博士的追求

——记邓嗣禹先生的一生	唐特凡	1
邓嗣禹著作年谱	唐特凡	27
北大舌耕回忆录	邓嗣禹	36

军校纪行	陈振渭	42
------	------------	----

戎马散记	陈振渭	97
------	------------	----

任职新疆见闻录	陈振渭	156
---------	------------	-----

回忆我的一段经历	陈 罗	164
----------	-----	-----

我的从商生涯和任职工商联的回忆	吕宗贞	177
-----------------	-----	-----

余筹办常宁机动船运输业的经历	李鹏程	203
----------------	-----	-----

李之透生平	尹龙渊	208
-------	-----	-----

回忆父亲肖云耕	肖一湘	211
---------	-----	-----

1989年10月出版

湘军将领唐训方记	肖一湘	217
唐训方年谱	肖一湘	230
奔驰数十年，清风回故里 ——记湘军将领陈封爵	尹龙渊	234
廖疤子的一生	龙跃兴	237
我策动廖苑起义的经过	唐仲山	245
段晚初其人	贺国英	254
台湾《常宁同乡会志》刊载的人物	尹龙渊摘编	256

· 读者信箱 ·

与《翰林王良弼》作者商榷	肖一湘	276
台湾读者来信：对“常宁商会组织概况” 一文的订正	尹涤寰	278

一位历史学博士的追求

——记邓嗣禹先生的一生

唐特凡

他，邓嗣禹，又名持禹，驰誉国际的历史学博士，逝世前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系退休教授。

他魁梧身材，方头大脸，眉宇轩昂，谦让并和蔼可亲。

他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历史学家，其经历坎坷非凡，著作硕果累累，但在国内的人们却对他的名字感到陌生，为什么？因为他离开祖国踏进异乡整整已有五十一个年头，那时，他才三十一岁。

他生前的履历表上记载着他在中外各地执教生涯中的步履脚印：

他于一九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宁县黄洞乡黄洞大湾的书香门第，父名杰卿，邑童生，母吴氏，生四女一子，他次序第三，适居众姊妹之中。

他小时，本读私塾，因年岁过大，幸遇一位殷老师示意要他缩小年纪才考进县内最高学府——合江学堂，毕业后赴衡阳工业学校就读，后考入北京燕京大学预科，再转本科，一九三二年毕业时，获学士学位，并当选为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主席。

一九三三年，与同学张维华共同负责燕大历史学会的研

究工作兼出版股长。

一九三四年，任燕大学学报主编。

一九三五年，毕业于燕大历史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旋即应聘担任母校历史系讲师，并获燕大司徒雷登研究奖助费。

一九三六年，续任上年各项职务，再获司徒雷登研究奖，任燕大历史学会稿件审查委员会委员，委员中如顾颉刚、邓之诚、洪煊莲等都是当时知名学者。

一九三七年，应友人房兆楹先生之邀，辞燕大职，去美国华府参加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韩慕义博士所编的《清代名人传记》编纂工作，任助理编纂。

一九三八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并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一九四一年，应芝加哥大学之聘，任讲师。

一九四二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代理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兼远东图书馆馆长。并负责美国陆军委托该校所办的“中国语言文史特别训练班。”

一九四三年，升任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

一九四四年，暑假中，任中国学园主任。

一九四六年，夏天回国，任北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授。

一九四七年，回芝加哥大学任中国历史及语言学助理教授。

一九四八年，在芝加哥大学教中国历史，史学史及目录学。

一九四九年，秋天，回母校哈佛大学任讲师，教中国史一年。

一九五零年，秋天，应美国州立印第安纳大学之聘，任历史系副教授，主讲中国史，日本史及远东史。

一九五三年，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董事，为期三年，获美国哲学研究社研究奖助费。

一九五四年，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评议会研究奖助费。

一九五六年，获傅尔布莱脱法案教研及交换基金的资助，至日本研究一年，并至台湾访问。

一九五七年，完成日本研究，返回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秋天，升任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正教授。

一九五九年，获美国学术社团评议会研究辅助员，为期一年。

一九六零年，为《大英百科全书》一九六零年版写专论。

一九六一年，夏天，赴母校哈佛大学，为访问研究讲师。

一九六二年，夏天，应邀赴明尼苏达大学教暑期学校。

一九六三年，秋天，赴华府之美利坚大学执教一年。

一九六四年，秋天，由美利坚大学回印第安纳大学。

一九六六年，荣任印第安纳大学讲座教授，迄至一九七六年退休。

一九六九年，秋天，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为期一年，

一九七零年，夏天，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满，返印第安纳大学，获美国学术社团评议会研究奖助费。

一九七六年四月，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系特为他设退休盛宴，六月，正式退休，此年，荣获联邦政府卫生、教育、

及福利部之人文科学基金的研究奖助费，为期一年。

.....

昨天，虽已作为一页历史翻过去了，但他昔日卓著的教育成绩决不会被世人忘记。人们关心的不光是邓嗣禹过去的经历，更关心的是他一生中所有著作的硕果，一位曾逾越八十二岁的古稀老人。

有人年纪轻轻便庸庸碌碌地把路走完，也有人在暮年仍然顽强地求索，直至生命最后的一刻。邓嗣禹属后面的一种人，尽管他生前已逾八旬，却仍然是一株不老松，暮年的枝枝杈杈都萌生着鲜嫩的新芽。

邓嗣禹一生追求的是什么？让我们展开历史的画卷，来看看他生前的言论和行动吧！

一颗赤诚“爱中华”的心

一九二六年的春天，北平的冰雪还没有完全解冻，天空却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时的段祺瑞执政府为了镇压爱国志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常宁在中俄大学读书的彭廷圭同学为争取自由和民主在执政府门前壮烈牺牲。他与邓嗣禹是一对知己同乡，属同庚所生，两人还同住一个寓所。当嗣禹得知彭廷圭牺牲的噩耗时，全身毛骨悚然，泪珠夺眶而出。他想：一个满怀壮志的革命青年，“一腔热血，就洒在执政府门前，未免太可惜了。”三年后，他又在《彭廷圭烈士纪念册》上撰写了《廷圭的思想同特性》一文，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三年来，我已流干脆弱的眼泪，现在用不着痛哭流涕，再来表示弱者的精神，我只好记着，只好继承

他的遗志大声喊叫：

啊！青年！

啊！光明！

啊！自由！

啊！平等！

起！起！起！

干！干！干！

竞！竞！竞！

装足马力，测准路线！

一翅飞过太平洋！

一翅飞上九重天！

这里，明显地反映出二十一岁的邓嗣禹当时的爱国热情和思想品德。

一九三七年的夏天，邓嗣禹接友人房兆楹从美国拍来的电报，邀他去美国的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编纂清代名人传记。他喜出望外，决心出国，只是因久病初愈，没有时间去筹办出国手续。至七月七日，才乘车去天津办理护照。这时爆发了芦沟桥事件，形势极为紧张，平津交通中断，北平西苑墙头上皆布满哨兵，敌机四处轰炸，人心惶惶。当时群众来燕京大学避难者，已逾万人。从此，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他决定从东北赴朝鲜，经日本，再去美国。沿途，他不但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暴行，而且他自己也遭受了种种虐待。从他自传体的《去国记》中的记载可看出当时之心情：

七月二十八日，燕大图书“馆内，人声就很嘈杂，每逢飞机投弹，窗户玻璃，辄震烫欲裂，虽力自镇静，而血热沸

腾，皮肤发烧。”

二十九日，“燕京大学的校门口，已有日本车，检查行旅，学校高悬美国国旗，不觉潜然泪下矣！”

三十日，北平的“城门皆闭，交通断绝，电话不通，无线电亦听不清楚，校园之外，日兵时而开经芦沟桥，时而退回洪山口，时而返青龙桥，时而开至南苑，屡进屡退，日夜不息，以战线宽广，人数不敷也，赵使二十九军，同心协力，一致抵抗，则平津之失，决不致为此之速也。……至十一时许，枪声渐稀，多方探听，通州保安队反正，杀死日寇汉奸，逃往芦沟桥，欲与二十九军会合，行近大钟寺，即被日军包围，飞机大炮，大事扫射，死伤极众，噫！日人以通州作罪蔽，设立特务机关，制造吗啡白面，毒害我农工，压迫我良民，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一旦有报复之机会，无怪受其颐指气使之保安队，起而反正也，然不旋踵即归于消灭，惨矣！”

三十日，他推车步行，“见满街日旗，悬挂门前，远远望之，联成一线，触目心惊。”

八月四日，他“归北辰宫，因刺激过甚，又因明日须冒险远行，故难成寐，皮肤发烧，起床十余次，累求上帝赐与勇气，皆莫能成补救。因当时想及海甸之惨杀，想及个人旅行之艰苦，想及日本之凶残，想及前途之荆棘，故热血沸腾，充满恐怖念头，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五日，“五时起，取回代购书籍留声机片等物，束装至车站。”于是，他便乘火车远行。

六日，“坐车至沈阳，转车到日本，则十日午夜，可抵横滨。左右维思，船既订好，改期维艰，决冒险作东北之

行。”

七日，“早八时，日籍侍者送余上车，余携手提包随之，过万国桥不远，即见屋宇，商店，有被焚烧者，有遭巨大窟窿者，有仅余断瓦颓墙者，十室九空，寂无人居，伤心惨目，不忍遍视。”

九日，“抵沈阳，见一日本籍军人下车，投一辅席于地，车夫举首欲语，似嫌少，军人即击车夫一鞭，昂首咯咯而去。余见之，不觉受一大打击，私自叹惜曰：‘此亦吾同胞也。’”

在车上，“见一日本文布告，从中文字中，可猜其大意，再过数步，有一同样之中文布告，观其日文书式之中文，大意是近来中国政府，派遣大批蓝衣社共产党（原文如此，为当时日伪之诬称——作者注）潜行入境，企图危害满洲国，凡有官民人等，无论何时何地务须严密缉拿，勿使漏网云云，余见之内心又受一打击。”

“下午与××游中国城，始发现中国商店，由日本人经营者亦掺杂过半，而所谓中国城，远离繁华地带，在全沈阳城中，从地图视之不过六七分之一，而日人已掺杂过半，其他概可想见，余慨叹亡国灭种何其速也。”

九日，“则离开国土长春，到达图门，……惊日人之夺我东三省，不过七年耳，铁路桥梁筑炮台以守之，路旁树木砍伐殆尽，以消灭我义勇军之活动，复以高压政策，压制人民思想语言行动，将见一、二十年来，东三省人民，与朝鲜无别矣！”

十一日，抵渝州“经过审问毕，余已不能支持，勉强挤卧于年老美国人之旁，心房忐忑，气息奄奄，殆有不久于人

世之象，于是大悔冒险之失，早知如此，何必有美国之行。”

“在室中，各人须填一纸单，西洋人为一种，余所填者为高丽满洲及支那人入境申请书，令人见之，不胜亡国之痛。前此在学校言爱国，不过人云亦云而矣；余至此时，方知国之真正可爱也。”

十二日，至横滨，“见常有各种广告及国旗标语等等，如‘欢送出征军人’、‘皇军万岁’及‘武运长久’之类，鼓励残杀，激动人民，以遂日本军阀侵略之野心。”

十九日，他才乘日船平安赴美。

二十日，“船上每日发无线电消息，人各得一张，我独无。假借他人者，皆言中国一败涂地。明知为片面宣传，心中亦极不安，着睡衣后，去饭厅取水，忽闻‘中国四处皆匪，中国无组织’之声，张目望之，正为一日人召集七八美国人，大事宣传，侮辱吾国，心中更觉不安。”

二十二日，“有一美国人间余通州惨案真像，余惊其何以知此事？因日本人散发小书一册，宣传中国之残忍，日本之仁慈云云。余解释日本人在通州之暴行，卖白面吗啡，设特务机关等等，民众均痛恨之。故直接被压迫之保安队，一旦有报仇之机，仍不免于流血报仇。……”

二十四日，“下午又来一美国犹太人，大骂日本，甚以为喜。”

二十七日，“船上召集所谓远东问题讨论会，参加者约百二十人左右，多为美国人，日本参加者不过少数政府说客而已，他们举出T君，站立讲演，尽是污蔑之词，颠倒黑白，余归睡床上，面觉发烧，不能为国舌战，蜀胜惭愧，至

八月二十八日，有一中年妇人，问余对于昨日会议之感想。余首先道歉，谓无勇气与辩驳，继则谓彼所述者，纯为信口雌黄，毫无根据。如曰沈阳事变发生于一九二八年，满洲政府现在中国人掌握中，芦沟桥军事演习有条约根据等等，皆极端错误，与事实相反，彼不过欲愚弄你们美国人，因为一般美国人，对于远东事情，不太留意，人名地名与时日尤不清楚，故日人能随意颠倒事实也。稍后余坐定，以一纸片，画一平津略图。告以日本去年以同样演习方法，占领丰台。丰台者，平津间最大之车站，由此可转平汉路，会于长辛店，长辛店亦为平汉路之车站，往北一站，即为芦沟桥，故日人欲假操练方法占领之，以图截断平汉路完成北平之大包围，仅留平绥路，作为中国人之退步耳，彼闻之极喜，谓从未见报上有些简略之说明，将华北事变之真相与日人之野心，和盘托出。言至此，有一德国人至，闻之竟发怪论曰：‘你中国弱，日本强，所以弱者应被强者征服。’余与之大闹一场，几至动武。下午，心中仍愤恨，在二、三等舱中，到处访友，名为船上时间，不久将逝，特来拜访，实则到处宣传，已力竭声嘶，扪心自问，略尽国民之责耳。”

上述日记，不但可以看出日军侵华暴行，也能看出邓嗣禹对日军侵华的举动是何等痛恨，虽想“尽国民之责”，但他是一介书生，孤掌难鸣，一路行程皆在日人控制之中。

邓嗣禹终于出国了，一晃就是九年，虽然也有过回国的遐想，但大半个中国正被日军统治，人民惨遭屠杀，就是太平洋也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不可能呀！他只好打断这个念头，专心钻研他的学术。久之，在精神上、生活上仍然缺少寄托，特别是一想念到祖国，想念到祖国人民和亲

人的时候，更觉茫然。虽老家娶有一夫人，却远离身边数千里，留在大洋的彼岸，因此，在美国继配了一位夫人。

她原来就是他的私人秘书，美国籍，他（她）们的结合，是通过多年的接触才产生了爱慕之情，以后，还生育了三个女儿，为了体现对祖国热爱，仍然遵照中国的习惯，依次取名曰邓爱美、邓中美、邓华美，三个名字的拚凑，不但象征着“爱中华”，也象征着中美友谊，这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体现，也表现出一个异乡游子赤诚的心。他爱人原任图书馆员，已近七十岁，“白鬓已老态龙鍾”，现在，为红十字会捐血做义务工作，无报酬。三个女儿皆大学毕业，均具有硕士学位，都成家立业，却散居美国各地，很少在一起，纵有，也是“一二年见面一次”。

一九八五年的九月，祖国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在北京举行学术讨论会，全国政协特邀他回来参加，这是因为他是研究鸦片战争的专家之一，在国内外很有威望。这次被邀的一共五人，皆海内外著名人士，其中，王赓五是当时将被委任为香港大学的校长，像这样的学术会他能被邀请，当然会感到高兴，所以，他回来了，他是秉着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及全国政协等领导人的敬仰，对研究鸦片战争这一历史课题有所裨益的情况下而回来的。他想，应该对祖国、对人民有所贡献。后来，他在给堂弟邓汝舟的信中说道：“从前国家政府只请杨振宁等科学家，此次破天荒，请几位历史学家回国纪念林则徐……梦想不到，忽被邀请，算是幸运。”

这次，他是九月十日到达北京的，一下飞机，立即想到在东北佳木斯的女儿邓同兰，所以稍事安顿以后，马上向她发了个电报，要求她去北京见面。同兰一接到电报，喜出望外，

即刻收拾简便的旅行用品，坐飞机赴北京，去看望多年未见的父亲。可是，等她去了北京以后，父亲却又乘飞机离开祖国，她感到惆怅，在归途中，思绪万千，埋怨父亲回国不应该告诉她，要告诉她那就不应该不辞而别呀！连见一面的机会都不行吗？这是为什么？至今还是个谜。

一九八六年，祖国落实侨务政策，其中包括华侨在中国的产业，应该归还华侨本人，这当中就有邓嗣禹的一份，他是华侨，是日军侵华时候便离开祖国去美国定居，现在老家还保存有他的几间近三百平方米的两层旧式楼房。常宁县侨务办第一个落实他的房产权，按政策，补偿他人民币九千元，县侨务办将这一决定写信告诉他。

不久，县侨务办收到他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寄来的一封信，感谢万千，并在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

“……为对祖国对故乡微表寸心，落实房产政策，补偿的九千余元，我分文不要，献给故乡建学校，另外，我还捐献一小部分钱来玉成此事，因教授一身清贫，退休十载又无任何收入，故不能捐献很多……”

信虽短短数语，但从每一个字的行间，皆可看出他的一片爱祖国、爱家乡的心情。有人说：他合法到手的一笔九千元的款项，偏偏一口送情，还要另外“捐献一小部分钱来玉成”建校，这图个什么？而他的回答却很简单，那就是表现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事后，他还经常与县侨办的负责人书信往来，一九八八年春节，还没有忘记从美国寄来贺年片拜年，以表示感谢之情。

一腔思乡和思亲之情

一九四六年，胡适任北大校长，聘他任北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授，他利用在芝加哥大学例当休假一年的机会，于夏天回国，并将书籍带回。回国后，想不再出国。他想起了家乡，想起了亲人，想起了妻子和女儿，于是，他省亲了，回到了老家黄洞。

他的原配夫人姓欧阳，名红玉，常宁县洋泉镇赵家冲人。当时已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邓祥瑞，二十岁便患脑溢血死亡，二女儿邓兆男，仅三岁又夭折，三女儿邓同男（兰），曾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共产党员，现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医学院副教授，教研室副主任，省政协委员，省侨联常委，佳木斯侨联主席。四女邓同桂，就是这次省亲以后生的，中共党员，现任佳木斯市华侨企业公司业务股副主任。

这是他去美国以后的第一次省亲，自然，家乡的父老兄弟以及亲戚皆格外欢喜，谁不想见一见这位离乡多年的知名人物，使他忙得应接不暇，但他回来要处理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接妻子和女儿去北京同居。

他把话对妻子说了，但妻子想了好久才回答：“不去。”为什么？“我一个乡下女人，土里土气，没见过世面，跟你出去反而有失你的体面，影响你的工作。”还说：“我在屋里有饭吃，有衣穿，出去以后，我讲话人家不懂，人家讲话我不懂。”这样的回答，是因为中国人的欲望，习惯上是容易满足的，不会提出过高要求，至少欧阳红玉便是如

此，因此，才说出了上面她要说出的话。

其实，他家当时并不富裕，有十来么田和万多株杉树子苗，收入并不可观，连邓嗣禹的学费还要靠卖杉树和邓氏族姓的次白公给予资助。有一次，他在燕大读书时，患了一次恶性盲肠炎，必须住院治疗，但没有钱，写信回去也无济于事，看来有停学的危险了，恰好正碰上他的表兄贺心梅，此人当时在国民革命军工作，还在李济琛身边当过秘书，因买了广东省的彩券，一下中了头奖，得奖金二万五千余元，才借他二百五十块光洋，使他治好病，继续读书，以后，还陆续资助他的学费。

邓嗣禹听了妻子的回答十分惆怅，快快不舍地离开了父母、妻子和女儿，离开了久别的家乡。

邓嗣禹的第二次省亲，是在一九四七年，为的是给父亲做六十大寿。这次回来轰动了黄洞的族人和各路亲戚，因为他带回了胡适和北京大学等重要人物与单位写来给他父亲祝寿的贺词，但他却没有迎屏做匾，仅仅将贺词请会写字的邓述赞将它写成条幅，挂在厅堂里，这在当时的黄洞来讲，也算是有些显得堂皇，吸引了一些达官贵人，他们听说邓嗣禹在北京很有名气，又在美国几个名牌大学当过教授，还说胡适要介绍他去国民政府当官，并被派为驻日本的专员（大使）。于是，他们也想趁此机会来捞上一把。当时，常宁的南乡有个曹××知道了这件事，便立即赶来黄洞，名为他父亲祝寿，实际上就是想通过他的关系，求得他的关顾和提拔，以便飞黄腾达。然而他说“按照你们的想法，当然赞成我走入仕途，对你们的前途有利，但我对当官是很淡薄的，我不能中断我的专业研究，始终不会转入政治旋涡。”他又在

《什么是中国的病根》一文中指出：“我认为自私自利，是最大的病根之一。”由此可见，他早就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痛恨那些贪官污吏，早就树立一生从事史学的研究事业，终生不介入政局的清白心境，所以，曹也就讨了个没趣。

这次他回来，虽然是专为父亲祝寿，但他并没有大讲排场，凡属亲朋所送的礼品，按风俗，除蜡烛与鞭炮以外，其余的一概退回，只是当天的中午办了六桌祝寿酒，简单地为父亲祝了寿。

一九四八年的五月，担任常宁县县长的钟显尧想在自己任期内，纂修一部《常宁县志》，得知他在北大任历史系教授，于是，乃于五月十三日向他发出公函，希望求得赐益。不出一个月，他便给钟显尧县长复了信，提出他的意见：

钟县长赐鉴：敬启者，贵府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呈秘字第五零九号公函召集邑绅会议，讨论纂修县志事宜，已由家人寄至美国，嗣离专修史学逾二十年，在中外名大学教授史学方法，中国史学史，西洋史学史，远东史，日俄史等课亦近八年，故对母县纂修志乘，颇感兴趣。窃思中世纪以前，无论中外，皆文史不分，能文者，即史家。自刘知已、郑渔仲、章实斋诸子而下，中国史学渐分立，浙东学派多史家，而桐城派似非以此见长也，十八世纪以降西方史学蔚为专科，以至今日，文史两边，屹然分立，以欧阳永叔之才，编修新唐书，文求简而大明，且伤史实，又撰新五代史记，多以呜呼发端，学者病之，章学诚之方志议体，伟见卓识，建树良多。近年上海各处所修之新方志，尤多改进，吾邑同治续修县志，民国二十六年，嗣离出国时，曾携带一部，送